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內在化的鬥爭：回應彭麗君〈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

Struggle over Internalization: Discussion with Pang Laikwan

doi:10.6752/JCS.201609_(23).0014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劉世鼎(Shih-Diing Liu)

頁數/Page：230-2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內在化的鬥爭：回應彭麗君〈公民抗命與法治共同體〉

Struggle over Internalization: Discussion with Pang Laikwan

劉世鼎¹

Shih-Diing Liu

彭麗君教授的文章（以下簡稱彭）是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以來，少數能夠冷靜剖析香港事態的一篇作品。彭從一種歷史化和辯證的切入視角，討論了香港複雜的集體情緒，把存在於香港的支配性話語（「法治」、「本土」、「身分認同」、「核心價值」）一一解構，指出了自戀式反中浪潮的迷思以及和殖民主義的共謀關係。文章還描述了雨傘運動對於領導權、組織、合作和暴力行動的分歧和鬥爭。彭的核心問題意識圍繞著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關於法律的思想。透過鄂蘭，彭對特定歷史條件下香港的法律和法治的關係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敏銳地探索香港目前所經歷的各種違法抗命和失序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意義。這是個難得的努力和嘗試。

彭所思考的重點是法律在香港的複雜性質、作用、局限和潛能。從鄂蘭的角度出發，她認為法律是「無本的」，其內涵和作用是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為特定階級利益服務，同時也被不同政治力量所挪用。法律非但不是外在於政治，而且與政治互為表裡。兩者相互構成、也彼此矛盾。按我的理解，就是任何試圖將法律、法治從政治、權力分離開來的論述，實際上的作用是將難以抹除的差異、對抗和衝突，以及需要透過抗爭才能獲得解決的問題，窄化為封閉的、菁英主義式的法條和法理。

彭試圖從法律—政治雙重構造的批判性理解，來解釋香港的歷史遭遇。她指出了法律在香港既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也被用來當作抵抗共產黨的武器。她梳理了香港法律的歷史性、脈絡性和階級性，並指出了當下以法之名

1 劉世鼎，澳門大學社科院副教授
電子信箱：sdliu@umac.mo

進行抗命及反中的矛盾趨勢。最難得之處在於，彭意識到既有的二元敘事（親中vs.反中）的問題，試圖從一個民衆的視角來尋求一個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出路。

建立在這樣一個批判性的理解，彭將鄂蘭的思想應用在香港的語境，相較於主流簡單僵化的論述，可以說提供了一個相當獨特的視角。但對於法律的過度強調，也可能會限制了我們從一種動態的、民衆實踐的視角來理解雨傘運動、香港和中國所經歷的對抗性。鄂蘭最有啓發之處是她細膩地拆解了法律的局限性，以及法律的建構所提供的政治介入可能性。雖然她對於法律的思考帶有一些反本質主義的色彩，但主要還是深植於歐洲經驗，而且有時顯得過於規範性，重形而上理念、原則，缺少了對實際而具體情境下法律如何成爲抗爭場域的分析。例如彭文章中提到，鄂蘭認爲人民「應該」擁有建立並推翻政權的終極權力，但如果只停留在一種規範性理念或純粹理想的探討，我覺得是不夠的。在重重歷史、經濟、政治和文化限制下，究竟人民是在何種基礎上、「如何能夠」透過法律（在她看來，是重新制憲）來重建社會？以及這種路徑在現實狀態下的正當性，這篇文章並未能提出解釋。彭對法律有著高度期待（「法律可以經過公共的政治實踐而成爲一道鑰匙，開啓一個新的、多樣異質的社會。」；「如果我們可以把法律看成爲人民自己經過平等政治參與之後得出來的社會建構，法律就可以代表人民，以及人民的多元和多變。」）。如同有時我們在鄂蘭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彭在討論鄂蘭時，和她在思考香港的狀態時，顯得有些斷裂，有些看法也顯得理想化。簡言之，人民在一個特定情境下，是如何「接合」成一個總體的（按拉克勞〔Ernesto Laclau, 1935-2014〕的說法），「如何」能（或不能）行使他們的權力去挑戰既有秩序、其條件和限制爲何？是更需要檢驗的問題。

彭試圖探索法律對香港權力結構和秩序鬆動的可能性，我覺得這是個很有意思的提法，但我更覺得法律實踐主要取決於具體的政治鬥爭情勢。即便法律是可能作爲一個政治介入的場域，法律作爲在特定狀態下、特定權力鬥爭的產物，也不能外在於權力鬥爭的場域。但彭對於這個場域的分析顯得不足。特別是放在變動的世界體系中，香港作爲中國一個「被包含的外部」，²其政治形構是需要分析的。這也意味著需要把香港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脈絡

2 這個概念是最近與賀照田的談話所啓發的。

下來討論，例如，隨著中國區域影響力劇增，香港群眾和政府的關係，以及與大陸、澳門、甚至臺灣，存在著哪些聯繫？他們的情感結構之間，存在著哪些聯繫？我認為需要回到國家與群眾關係、黨的代表性和正當性這些根本的問題上。彭認為中國是「不視自己為殖民者的殖民者」，「香港現下的掙扎躁動與其說是反殖，不如說是反國族」。但從何種意義上，中國是新的殖民者？彭沒有解釋，她所引用的周蕾，也是從一個比較簡化的角度來把複雜的中港關係套上一個「殖民」，好像就能解釋一切問題了。其次，如果中國是殖民者，那香港的掙扎如何說是反國族、而不是反殖呢？這兩個宣稱過於簡化，而且存在矛盾。

我認為簡單地將中港關係理解為殖民關係，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跳脫出彭所批判的本土主義思潮。或者說，以殖民的角度來理解中港關係、香港問題，把許多複雜曖昧的東西給取消掉了。不同於彭，我認為**香港所經歷的是中國把外部逐漸內部化過程產生的矛盾的綜合，同時也折射出一些中國內部普遍存在的問題**。歷史上香港曾經是中國革命分子聚集之處，後來也成為中國「策略性融入」世界資本體系的一個重要窗口、平台。換言之，香港無法置身於中國之外。但99年後的內部化又激發了一波新的矛盾。香港的後殖民轉換讓舊的矛盾與新的矛盾匯聚成為一場政治危機。以下我將延續這個思路，簡述近來思考心得，或有助於進一步深化討論。

一、將外部內在化的表徵

放在中國的脈絡來看，香港作為英國前殖民地、回歸後成為中國主權領土的一部分、作為向臺灣展示的一國兩制範例，有其歷史及地緣的特殊性。然而，當代香港所經歷的矛盾，在某些方面卻結晶出經歷了文革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仍舊難以克服的政治（同時也包含了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危機。這個政治危機，同時也是理論及思想的危機。這個政治危機，既來自中國外部，也來自中國內部。我的討論主要圍繞內在性的矛盾。這個內在性矛盾是透過黨國的論述、配置及實踐仲介的。我認為內在的矛盾提供了外部運作的基礎。

前陣子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表示香港沒有依法實行「去殖民化」，但又「去中國化」，造成巨大內耗（觀察者編 2015/09/21）。他認為香港需

重視歷史，面對現實，認為不把握優勢就會不進則退。陳佐洱又大讚澳門主權移交之後，GDP長期保持雙位數增長，經濟發展大幅拋離香港。隨後，《蘋果日報》刊登李怡的回應文章，認為97之後香港實際上是被中國殖民。他舉出的例子是中國政府施加政治權力對香港引入大量移民，增加香港的房屋、教育、醫療及福利的負擔，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因此他認為，只有依照基本法22條規定，要求中央不得干預香港事務並由香港決定移民人數，才能去殖民化。

陳佐洱和李怡的言論，只是近幾年中港矛盾的最新版本。從2003年反對23條以來，香港反對共產黨對香港生活方式的干預，以及隨後一連串反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服從行動，形成了新的去中國化（或去大陸化）浪潮。一種新的情緒結構形成了：從對過去的偏見轉移到日常生活的不滿——遊客不文明行為、搜刮奶粉、水貨客、瓜分學校資源、香港產子，轉移到對香港內部新移民的排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高舉龍獅旗也都是這一波去中國化的表徵。雨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將這一波去中國化推向最高點。

陳佐洱的發言試圖為這一波抵抗提出一個理解的框架，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香港的抵抗被視為是殖民主義的延續，提供了去中國化的基礎。其二，中國政府仍舊以經濟發展、區域整合來合理化一國兩制的優越性，並以經濟數字建立統治合法性。這和我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公平、代表無產者及收壓迫者的利益）有極大的落差。香港是不是延續了殖民主義，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論性的提問，一方面這個問題指向了香港回歸前回歸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同時我們看到香港出現了極右翼所提出的中國殖民—帝國論。近來港臺兩地的反對運動中都包括了歌頌殖民歷史、去中國化的認識論。這種現象主要源自於這個地區的歷史怨恨及不信任。然而，除了批判這種認識論之外，我們似乎也應該追問，這種認識論究竟是在什麼事態、脈絡下重新浮現的？與當下的關係是什麼？究竟該將其視為被殖民者自身的錯誤意識、或凸顯清理殖民地經驗的迫切性，或應當視為這兩地青年對當下被統治、被對待方式的一種回應方式？上述兩種認識論框架，難道沒有透過自我 vs. 他者的二元對立，將更為複雜的問題給取消掉？

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公共論述中感知到這個脈絡，以及這個脈絡對香港批判思想形成的制約。最近有篇文章，標題是「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決定」。該文作者香港中大政治系教授黃偉豪(2015/09/14)指出：「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錯誤，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錯誤。」文章細數香港制度及治理的倒退、崩壞，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實驗是個徹底的失敗。文章說：

香港的瓦解所反映的基本現實是，在中國收回香港後，「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根本無法真正落實。考慮到中國本身的人治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根本無法對自己的權力進行有效的約制，「一國兩制」只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幻想。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收回香港是造成今日面對的瓦解的第一步，亦是最大的一步。(2015/09/14)

作者對中國無法制約自己的權力而對香港進行干預感到憂心。他認為，中國及香港的發展水準懸殊，會拖垮香港的發展，無法單純從民族主義強行統一。作者認為香港的金融市場及經濟獨立性、自由度大不如前，是建立在對金融資本主義體系的肯定之上的。這種肯定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規則、關係及霸權的認可，也就不難理解作者會埋怨當時經濟不發達的中國、乃至於當下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會拖垮香港。所謂的香港人命運被中國主宰這一說法，也大致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想像基礎之上所衍生出來的論述。香港現在的主要論調是香港的命運被一個龐大的、落後的政體所支配。然而這種受制於人、不能實現自我獨立自主的憤恨感，是透過擁護資本主義及其支配關係這一意識形態空間所伸介、所強化。當然，這種中介的形式有其地緣及歷史的特定性。早年共產黨將組織群眾、為群眾的思想轉化，提供準備當作推動社會主義革命首要任務，如今，共產黨以保存香港的資本主義、創造資本家獲利環境為首要任務。

二、為什麼在香港失敗？論「中國模式」

如果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香港的鬥爭實際上是中國總體「維權抗爭」浪潮的一個有機環節。當今中國許多群體事件的觸發原因之一，大多是「投訴無門」，或者確切地說，各級政府部門不但對基層合法合理訴求不聞不問，或偏袒資方或有權勢者，還以各種方式進行打壓，導致群眾採取激烈的手段控訴。如果拉到更宏觀層次，這些看似零星、地區性的群眾抗議，折射出的是整個治理思想、治理方式與人民群眾存在嚴重脫節、斷裂，甚至是矛盾的政治問題。無論是在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愈來愈多群眾走上街頭。他們之所以用身體來抗議，出於不同、矛盾的原因，但總的來說，都是對於愈來愈不安定、愈來愈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狀態的反應。這些街頭政治把真實的不滿及樸素的願望，接合到了形形色色的本土主義、甚至極右翼思潮，形成及其複雜的自我保護運動，而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這是真實而

迫切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能否克服、由誰來主導克服仍舊是個問題。香港當然也屬於這個事態結構的一部分。以物質化、短期的經濟利益來進行統治而不考慮社會公平，空洞而貧乏的官方話語要求群眾「愛國」，而忽略了政治的建構是需要實質的、可感知的身體體驗（包括讓人過上有尊嚴而自由的生活、感受到平等與正義、尊重差異等）才能落實，再加上各種負面事件，造就了今天的危機。

香港所面臨的困境，也反映出8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所設計的一國兩制的主權方案的失敗。這也可以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危機的一個表現形式。這個失敗與纏繞的資本主義，與整個共產黨在面對「普世價值」時無法提出有力的論述、立場及方案，無法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注入新的活力，無法創造一個更平等、自由的條件，有著密切關聯。主權轉移後，共產黨本來應該要轉化群眾、領導群眾走向更平等、公平，但卻放棄了這個政治責任及使命感。批判的思考者除了指出香港與殖民主義的藕斷絲連以及去殖民化的不足，也需要將殖民主義延續論及中國帝國主義論所浮現的政治條件及狀態問題化。同時也應該對制約去殖民的機制問題化。這意味著需要對既有的、建立在認同宣稱上的認識論，以及建立在認同宣稱之上的利益與信仰進行反思。我們看到官方的政治主要集中在中國主權、領土、民族感、血濃於水及同胞論述，但香港的極右幾乎是以同樣的框架來進行動員。兩者都建立在對港式資本主義的肯定上。因此，這種認識論框架是否能有效回應這個區域的內在矛盾，我有疑問。這套認識論能否幫助我們理解並克服所有的社會身體所處的、所共用（而不是區分你我）的不安全、不穩定、岌岌可危的被剝奪狀態，能否回應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後果，也是需要被檢驗的。

這個反思或許可以從所謂的「中國模式」這一話語認識論展開。這類敘事已經被中國vs.西方的二元對立邏輯所結構化、本質化了，以至於限制了一個認識以民族國家為鬥爭空間的矛盾，以及真正的批判可能性。站在「西方」的論點將「民主」這個符號窄化為多黨制、選舉制度，這我就不多說了。而站在「中國」這一方，有一種菁英主義及保守主義的立場，誇大「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主張強大政府、限制群眾權力，絕口不提國家以合法化的暴力來維護資本。「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能源消費國、第一大鋼鐵生產國、高鐵里程全球第一」所表露的民族主義，或「中國需要一條適合自身的道路」的說法，似乎成為了資本對勞動權利、土地權利、居住權利及環境權利的剝奪以及國家鎮壓的托詞。社會不公被看作

是經濟發展的必要代價。隨著資本積累的深化，群眾的就業、土地、居住及環境的權利面臨深刻的危機。有些學者形容中國勞工的處境不是被剝削，而是「超級剝削」(Foster and McChesney 2012)。

究竟為什麼一個高度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城市，造就了一場以爭取選舉權為目標的占領運動？這是個極其複雜的政治行動。這場運動需要更細緻的分析：行動者如何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行動，累積了動員的能量，以及主流媒體、網路傳播在整個動員過程中的作用。透過這些機制，社會身體所處的不安狀態被轉化到了以選舉為名的反霸權集團。一方面，這場運動包含了上述對於資本主義霸權的肯定；但另一方面，這些行動在某種程度上質疑了黨組織所設定的框架，也就是我所說的以行動來重構與共產黨、與中央政府的關係。

相應於中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增長，中國在面對港臺策略依舊是以經濟發展、經貿關係來試圖達到政治的整合，但缺乏一種政治關係的確立。這種政治關係並不能化約成制度、經貿協議，而是需要取得情感及意識形態的認同，同時也需要重建與人民的關係，在實踐上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及價值。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顯然很難獲得港臺兩地普通民衆的認同。在中國內部，共產黨員、官員系統性貪腐、權貴階級濫權、自由的討論空間受限、以及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是這種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徵。在香港，這種政治文化具體表現在疲勞轟炸式的忠黨愛國，以及官方對權貴資本主義的維護。香港民衆對於政治經濟階級的忿恨及不滿，在雨傘運動中全面爆發。

三、回到「人民」

當我們試圖尋找一個方式來理解這些危機，另一方面國家卻急欲將這些危機中立化、規範化了，並壓制這些危機所產生的異議。人民表達及行動的政治空間，及人民的「能見度」被壓縮到最低。在人民民主參與的問題上，1989年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可以說是大倒退，在限制國家機器權力、民主表達及參與方面，甚至是遠不如文革時期。對異議及自發行動的壓制，與嚴重的社會不公及不正義是相互構成的。當我們看到無數弱勢群體求助無門，在爭取權利時被鎮壓時，便產生了需要提出一種批判的欲望，一種新的對於這個政府及政權的批判，並且要求一種新的政治性。一位反思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的學者就指出，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會比美國支配獨大的時代更多元一些，但並不意味

著中國所統治的世界會更為進步(Therborn 2008: 57)。在我看來中國模式對於勞工、農民、中產階級及環境的剝削及對異議的壓制，迫切地需要批判地檢驗。這個檢驗不是將中國模式看作是理所當然，而是要問題化，並放置在具體的脈絡中來看待不平等如何被合法化。這意味著新的批判需要與黨國機器拉開距離，站在人民的立場，對國家暴力與人民活動進行分析。當國家機器對資本系統性剝削視而不見時，批判的思考者應該要直指這個共謀關係，將人民、異議視為是社會主義的資源，是抵抗官僚主義的武器。不同於彭所強調的法律，我認為應當要側重人民的行動，並且將人民的行動放置在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變遷下來理解。鄂蘭關於政治行動的思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能夠提供一些靈感。

如果人民、群眾是當代中國的統治基礎，我們有必要對人民在不同歷史程式中的在場或缺席提出討論。1949年後，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先鋒黨的姿態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介入。薩米爾·阿明(Amin 2013)指出，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後，仍舊對經濟發展保持著主權式的介入，使得中國式的市場資本主義不同於過去依賴歐美日而崛起的經濟體。他認為中國雖然自1990年代以來也走上了類似資本主義的道路，但依舊保有其社會主義性質，在世界體系中崛起並干擾了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阿明也指出中國的發展方式所面臨的挑戰，包括了民主問題。在批評多黨制及選舉為「空泛的修辭」之餘，他批評當今中國的穩定是建立在「去政治化」的基礎上，社會需要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再政治化」，對「群眾路線」重新創造。然而阿明對於中國主權方案的解釋，並未能顧及到中國改革及國家打造(state-making)所面臨的、更為複雜的政治現實及矛盾性。歷史地來看，中國對香港進行的主權方案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體制的保存上。香港回歸後，黨國逐漸以促進經貿合作、深化金融整合等方式來增加在香港的影響力。然而這個融合了新自由主義的主權方案，在香港所造成的效應是複雜的、多層次的、矛盾的，並且遭到了抵抗。究竟黨國所建立的——借用阿明的說法——「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如何強化了香港的去政治化？中港經濟整合的性質及後果為何，如何提供了政治運動的條件？這些是我想提出的問題。

阿明想說的去政治化，或可被理解為原本存在於無產階級與黨的組織之間的「辯證的對抗性」被規範化及中立化了。³這是盧卡奇在面對東歐共產

3 關於階級和黨之間的辯證關係，參見Lukacs(2014: 29-30)。

主義運動中的階級結盟問題所提出的洞見。在一個去政治化的框架裡，無產階級只是整個社會一個部分，而共產黨所代表的是整個社會——而非特定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被相對化、分割成各個「弱勢群體」、邊緣化。中國的去政治化，可以說是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崩潰所造成的後果之一。1980年代共產主義的內爆，使得非資本主義化的可能性一步一步瓦解(Harvey 2012: 202)。緊接著是一連串的改革，在中國表現為社會主義政治的崩解，以及官僚階級的貪腐及權貴化，以及整個社會空間與社會關係的私有化。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再政治化的可能來自於群眾、或無產階級的異議及自發的行動。這種行動最具有生產性的結果，就是不順從黨國所強加的關係，要求重新組織群眾與黨的關係，重新將群眾與黨之間被壓抑的辯證對抗性重返政治空間。當群眾的行動與黨組織所設定的框架產生決裂時，新的政治就產生了。最極端的形式是革命，或照列寧的話來說，當底層階級不想要舊的方式、上層階級無法以舊的方式進行時，革命的條件便出現了(Lukacs 1998: 29)。

四、政治是什麼？

前陣子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刊出了一篇名為〈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文章，稱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呼籲共產黨組織及黨員要「忠誠於黨」、「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決服從黨中央命令」，全黨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仲祖一 2015/09/15）。文章還呼籲「決不允許對中央政策說三道四、亂評亂議，甚至對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不同意見」。但人民怎麼會無緣無故忠誠於黨呢？當政府的行為已經與群眾分離，充滿了與大資本的妥協和機會主義，對於黨的忠誠、對黨中央權威的擁護只能是利益和投機導向。如果共產黨已經成爲一個掌握政治經濟權力的集團，並且與群眾利益產生矛盾，其權威、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就自然產生矛盾。我認爲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改革開放以來遲遲未解決的理論及政治問題。我們可以批評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主義或虛偽，但不能否定，任何統治是需要建立在被統治者的參與、認可及感受之上的。黨的統治行為，也需要與群眾的行動保持一定的辯證緊張，容許群眾活動的空間，才可能延續。

今天的中國，人民表達的權利基本上是被限制的，或者說，是被黨國所中立化、規範化的。中國的穩定也是建立在這種剝奪、規範化及去政治化之上。

如何能克服這種去政治化的狀態？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容易，但我認為提出這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是有意義的。在「經濟增長」、「生產」、「市場」的經濟要求全面支配身體、生命及生活的今天，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思考政治、民主及行動的重要性？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政治究竟是什麼？政治的本質是什麼？我覺得洪席耶總結的很好：政治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鬥爭，也是那些在既有結構中無權、無分者與控制這個結構者之間的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宣言》中也寫道：「工人階級革命的第一步是要將無產階級提升到統治階級的位置，去贏得民主的戰役」(Su 1994)。今天的中國，不僅沒有達到共產主義所設想的無階級社會，反而是極端不公平的階級社會。王岐山最近提到要解決「不平等」問題，認為如果不解決「中國社會無法繼續下去」，正說明了這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高美 2015/09/21）。⁴

五、國家作為矛盾的綜合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轉型時期的國家政治形式(Balibar 2014)，他似乎預設了這個政治形式會自動地轉化成為自由人的聯合。然而，現實告訴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式是一個多元矛盾的綜合。隨著共產黨的「去無產階級化」，專政形式完好無缺。如果1980年代的共產黨依舊保留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的话，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和「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勢必與這個專政形式產生衝突。目前香港的抵抗，表面上是針對特首，但包含了針對這個「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形式。面對香港高度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這個專政是要去保持、而不是去改變支配的結構。殖民時代的惡法、陋規及作風跟合理的東西都被保留下來。然而，這個專政及其代理人在縱容資本家、卻又試圖以政治權力來干預香港時，統治的合法性就開始動搖了。1999以來，共產黨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不是以法律、經貿來建構，就是以空洞的愛國主義教育來維持，缺乏具有生產性的政治論述、政治想像及政治認同的建構。這與共產黨的總體路線（或缺乏總體路線）及作風很難脫離關係。在香港民衆

4 這個合法性危機是在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浮現的。最近《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一刻也不能弱化〉評論，強調要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教育中的主導地位，不能被儒家思想取代（孫力 2015/09/29）。

的普遍印象中，共產黨是與權貴、貪腐畫上等號的，事實上，香港的社會不公並沒有得到緩解。官方所推動的區域經濟整合，事實上包含了對資本家利益及剝削結構的鞏固。共產黨及特區政府長期以來對於社會公平、民主參與的忽略，以及對於人民行動的否定，對於市民社會中集體情緒缺乏認識、而一味進行道德化的指責，使得香港的政治變得高度道德化、部落化，退化成為激進的族群對立及新的種族主義，而對香港資本主義——無論是制度還是意識形態——絲毫不構成威脅。圍繞著主權精神的身體政治，是透過維繫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打造的。我認為，這是當代中國實現主權方案的一個挫敗。如果要適切地理解這個挫敗，我們需要對整套黨國機器所生產的民族、所規範的身體、所壓制的辯證性的對抗，提出質問。如果要克服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似乎應當從被規訓的身體開始思考：什麼樣的身體行動能夠對主權化的資本權力（同時也是資本化的主權權力）提出挑戰？這個行動同時也是要求打破黨組織所設定的標準、規範以及框架，要求與黨國的辯證關係。

我認為今天的中港矛盾，應當被看作是中國式的新自由主義下的政治表現形式之一。這個矛盾源自於無法建立一種政治關係、提供一種政治願景，無法積極轉化群眾、領導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這裡所說的政治，不是侷限在國家機器、制度及法律所規定的政治，或是以經濟表現來建立合法性的政治，而是如何透過論述及事件建立知識及道德領導權的問題。彭並沒有注意到這個政治方案的重要性。盧卡奇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黨〉這篇文章中指出(Lukacs 1998: 30)，如果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該朝向什麼方向不確定，如果它的無產階級性質無法被制度性地捍衛，那麼其他團體〔指的是資本家〕會滲透進去並將其路徑給偏斜了。」我們看到這個曾經作為無產者代表的組織部分成員，正在忙著與資本家眉來眼去。在這種背景下，他們的員警、司法部門和地方政府脫離群眾，也就不難理解了。按這樣理解，以民族、國家、同胞論述進行的動員本身就是個弔詭：在不對社會身體所處的不安狀態進行反思批判的情況下，極右翼也可以挪用國族來進行動員。在大敘事鬆動甚至是瓦解的情況下，以歷史的、政治正確的「國族」來對抗另一個右翼的「國族」論述鬥爭，或許還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批判知識圈如果還停留在國族層次來思考，其論述將喪失解釋力和說服力。我認為主張港獨、臺獨、歌頌殖民歷史的認識論，都需要放在這個脈絡下來理解才能掌握意義。那些批評異議者不愛國、戀殖的認識框架，也需要回應、反思這個脈絡中的政治問題，才能提出更有效的批判。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觀察者編。2015/09/21。〈陳佐洱：香港被超越 深層原因是「去中國化」〉，
《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local/2015_09_21_335023.shtml。
(2015/09/26瀏覽)
- 孫力。2015/09/29。〈人民日報熱點辨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一刻也不能弱〉，
《人民網》。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929/c1003-27645091.html。(2015/9/30瀏覽)
- 仲祖一。2015/09/15。〈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求是》。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5-09/15/c_1116549966.htm。(2015/09/27瀏覽)
- 高美。2015/09/21。〈重磅！王岐山怎麼看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
《鳳凰資訊》。http://news.ifeng.com/a/20150921/44703459_0.shtml。
(2015/09/28瀏覽)
- 黃偉豪。2015/09/14。〈收回香港是一個錯誤決定〉，《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4-opinion-wongwaiho-hongkong/。
(2015/09/20瀏覽)

二、外文書目

- Amin, Samir. 2013. "China 2013," in *Monthly Review*. 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hina-2013/ (2015/09/02瀏覽)
- Balibar, Etienne. 2014.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Verso.
- Foster, John Bellam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2012. *The endless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 London: Verso.
- Lukacs, Georg. 1998. *Lenin: A Study i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Verso.
- . 2014. *Tactics and ethics*. London: Verso.
- Su, Shaozhi. 1994. "Rethinking Marxism in the light of Chinese reforms," in *Whither Marxism?* edited by Bernd Magnus and Stephen Cullenberg, pp. 235-250. London: Routledge.
- Therborn, Goran. 2008.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 Verso.